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灵龟峰问禅

尹运中

攸州古城之东，行约三里，有峰独秀，形若灵龟探水，故名灵龟峰。此地古木森森，幽谷如藏，凉水环绕，烟岚相映。春日鸟鸣山更幽，夏夜听风林涛涌，秋见云影悠悠，冬以此心觉静。晨钟暮鼓之间，这座自古便享“攸州第一峰”美誉的名胜，宛如一处遗世独立的人间仙境。

灵龟峰不独以景胜，更以文名。据《攸县城区地名考略》，早在明末，邑绅刘伯相便于峰顶建文帝祠，坊间更传唐代即有梵刹于此。岁月悠悠，灵龟峰早已是一处集山水灵气与厚重人文于一体的宗教圣地。

行至山脚，先见山门巍峨，飞檐翘角，红瓦灰墙间尽显古朴典雅。门楣之上，“灵龟寺”三字乃赵朴初先生墨宝，笔力遒劲。山门扼守入寺要道，气象庄严，令人未入其境，先正其心，肃穆之情油然而生。

穿过山门，拾级而上，便是天王殿。殿宇重檐叠翠，金碧辉煌，在蓝天映衬下蔚为壮观。殿前左右，钟鼓楼对峙而立，更增威严。殿内正中供奉弥勒佛，慈眉善目，袒胸露腹，示现大乘佛教慈悲宽容之旨；两侧四大天王怒目护法，威震四方；韦驮菩萨以此镇守，护持正法。

出天王殿，折向东北半山幽谷，便见大雄宝殿庄严坐落。此处为全寺核心，左右配殿如众星拱月。大雄者，佛之德号也，意谓佛具大智慧，能降伏心中诸魔，镇雄大千世界。大殿之下，别有洞天。幽谷之中，碧池映影，曲径通幽，汉白玉栏杆盘绕其间，石桥飞渡流水之上。

谷底建有广场，平铺大理石，洁净无尘。四周峰回路转，古木参天，两座亭榭未墙画壁，翼然临于水边。亭榭间立十八罗汉像，或闭目沉思，或欠身伸腿，或双手合十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似在向世人无声说法，指点迷津。

此间景致，尤以古诗碑林为最。三十二方诗碑嵌于崖壁，其中十方专咏灵龟峰，皆出自明清攸县名士之手。清代知县陈涛进士出身，其《灵龟峰观涛》一诗最为撼人心魄：“孤峰东抱大江回，江上飞甍楚阁开。风鼓鲸钟摇海岳，月明蛟窟见楼台。千林晴霭薰蕉履，万壑流云泻酒杯。最是桃花春涨好，惊涛吹作雪山来。”诗人笔下，奇峰、大江、飞阁、鲸钟与拍岸惊涛浑然一体，读来只觉胸襟激荡，气象万千。

若欲穷千里目，须登灵龟顶。沿谷底石阶攀援而上，穿过葱茏蔽日的古木修竹，便至峰巅。此处掩映着一座古老的建筑群——观音阁。院落三重，依山势坐西朝东，青砖灰瓦，古意盎然。门匾“震震灵峰”匾额，柱刻清代楹联：“黄云紫雾天张盖，翠壁苍岩地拥屏。寥寥数语，写尽此间山水气象。

阁内供奉观音大士，全身璀璨，慈眼视众生。院中香炉终日烟霞缭绕，与山间晨雾相接。大殿临江一侧，栈道悬于峭壁，尽头筑有观涛亭。凭栏远眺，深水如练，苍穹无边，水天一色处，尘世喧嚣俱寂。

徜徉栈道，听风观水，心有所感。人生如登山，去日苦多，来日方长。唯真才可通达，唯善方能包容，唯美始得悦心。立于灵龟峰顶，看江流不息，顿觉心盈正气，顿悟皆空。或许这便是此次重游灵龟峰，山水与佛光给予我最好的馈赠。



掩映在葱茏绿意中的灵龟寺建筑群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株洲风物

茶陵高院祖安村，谭延闿纪念馆

苍茫邓阜，一座山的文脉赓续与铁色荣光

苗苗 刘和云

同治十年(1871年)，晚清名臣、茶陵人谭钟麟主持纂修《茶陵州志》。当墨笔行至州东八十里处，这位见惯了江山风雨的先贤，似乎也不禁为家乡的一抹苍翠所动容，留下了极为简练却传神的注脚：“邓阜山在州东八十里，高不可丈，其上有甘泉佳木。”更是不吝笔墨，许下了“茶陵胜迹邓阜第一”的盛誉。

这座静卧于茶陵东部高院镇的巍峨山峦，北接攸县，东临莲花，九渡河如一条碧玉带蜿蜒穿行于脚下，水陆通衢，气象万千。它终年云遮雾绕，草木葱茏，不仅以拔地参天之势容纳了湘东的万千灵秀，更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老人，见证了这片土地数千年的风云激荡。

山川不语，岁月有声。当我们翻开历史的尘烟，拾级而上，会发现邓阜山绝非区处一座地理坐标。从明清文坛的墨韵流芳，到革命年代的铁血荣光，再到近现代工业的铁血崛起——文脉、烽火与矿脉在这里交织共生，镌刻成高院乃至湘东地区不可磨灭的文化图腾。

灵山秀水：龙匣书香的宰相风骨

邓阜山的甘泉，既润泽了满山的苍翠，更浇灌出高院绵延千年的崇文重教之风。自宋以降，这里书院林立，诵读之声不绝于耳。山峦环抱之间，孕育了无数科举英才，而其中最耀眼的星辰，当属明代“茶陵诗派”领袖、内阁首辅李东阳。

李东阳祖籍高院龙匣，虽生于京师，长于天子脚下，但那份源自邓阜山麓的灵气一直流淌在他的血液里。史载其自幼聪颖，四岁即能与明宣宗对答如流。那是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生动场景：面对身量尚小的李东阳跨不过高高的宫门门槛，皇帝戏谑道：“神童脚短。”稚气未脱的李东阳昂首对曰：“天子门高。”皇帝大悦，将其抱置膝上，见其父李爱侍立一旁，又出联试探：“子坐父立，礼乎？”李东阳不假思索地引经据典：“嫂溺救援，叔也。”这一番机敏与才情，不仅博得龙颜大悦，更预示了一代文坛宗师的崛起。

成化八年(1472年)，李东阳因丁忧奉旨省亲归乡。这是他生命中难得的归去来兮。他看邓阜山的云卷舒，听九渡河的潺潺流水，挥毫写下“我家龙匣水，浪滚入南溪”的深情诗句。在那个春日里，他看到乡亲们杀猪宰羊、击鼓焚香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笔下流淌出的不仅是“杨柳深潭叶叶新”的清新画卷，更是对故乡淳朴民风的无限眷恋与尊重。立朝五十年的，柄国十八载，李东阳以“清节不渝”的风骨，为邓阜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让这座山沾染了翰墨的清香。

若说李东阳代表了邓阜文脉的“才”，那么谭延闿家族则诠释了这里的“义”与“孝”。作为“民国三谭”的核心人物，谭延闿不仅在政坛、书坛建树颇丰，其为人处世更深得湘东文化中“孝义”二字的精髓。

坊间至今流传着一段感人至深的往事。少年谭延闿被称为“小三公子”，因生母李太夫人系侧室，不仅母亲受尽冷遇，连带他也常遭白眼。母亲那句含泪的训诫——“你务必懂事争气，方能出人地”，成为了他一生的鞭策。为此，他立下“不纳妾”之誓，以此慰藉母亲在天之灵。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李太夫人出殡之日。按旧时陋习，妾室灵柩只能走侧门。谭延闿悲愤交加，这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书生，竟直接趴在母亲的棺木上，对阻拦的族人厉声喝道：“今日谭延闿已死，请抬我出殡。”他以这种决绝的方式，扶棺力争，终使母亲棺木由正门而出。这种刚烈与深情，与高院地区李、谭、陈等家族“敬山亲水、崇文重义”的家族传统一脉相承，共同构筑了邓阜山深厚的人文底色。

“你务必懂事争气，方能出人地”，成为了他一生的鞭策。为此，他立下“不纳妾”之誓，以此慰藉母亲在天之灵。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李太夫人出殡之日。按旧时陋习，妾室灵柩只能走侧门。谭延闿悲愤交加，这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书生，竟直接趴在母亲的棺木上，对阻拦的族人厉声喝道：“今日谭延闿已死，请抬我出殡。”他以这种决绝的方式，扶棺力争，终使母亲棺木由正门而出。这种刚烈与深情，与高院地区李、谭、陈等家族“敬山亲水、崇文重义”的家族传统一脉相承，共同构筑了邓阜山深厚的人文底色。

烽火峥嵘：罗霄山脉深处的红色回响

当时光流转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邓阜山的青翠被一层更加炽热的红色所覆盖。凭借其山高林密、进退自如的地势，这里成为了罗霄山脉西麓红军休养生息的重要屏障，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淬炼场。

1928年5月，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战斗——高院战斗，在此打响。彼时的邓阜山，松涛与枪声共鸣，硝烟遮蔽了云雾。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事对抗，更是毛泽东游击战思想“十六字诀”的一次鲜活实践。

让我们将目光拉回那个烽火连天的春夏之交。红军战士们带着精良的重武器，但他们有邓阜山。他们依托山脚的乱石与松柏为天然掩体，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。敌军盘踞在集镇的碉堡与高墙之后，负隅顽抗；红军则如山间的猎豹，忽隐忽现，猛攻敌阵。在九渡河畔的激战中，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”不再是纸面上的理论，而是战士们在生死瞬间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战术灵光。

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基因，是随着九渡河水流淌进每一个高院人血脉里的。1948年，当王震将军率领南下支队途经邓阜山时，革命的火种再次被点燃。邓阜山下的苍翠、麻田两村，一批批热血青年闻风而动，他们放下锄头，穿上军装，毅然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之中。

回望那段岁月，茶陵百姓以山林为家，视红军为亲。为了给红军带路送信，为了给伤员送一口热饭，多少乡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宁死不屈。如今，当山风拂过九渡河，松涛阵阵，仿佛仍能听见那段峥嵘岁月的激昂回响，那是邓阜山最坚硬的脊梁。

铁色记忆：从“乌金”传说到工业乌托邦

如果说文脉是邓阜山的魂，红色是它的血，那么深埋地下的矿藏则是它的骨。在邓阜山的地层深处，沉睡了亿万年的地质宝藏，等待着叩响工业文明大门的刹那。

邓阜山的工业传奇，始于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开端。民国八年(1919年)秋，高院水头村道人陈锡麟在瓦子坪兴建清源寺。当锄头掘开泥土，一种“色黑质重、乌光夺目”的奇石惊现人间。起初，人们莫能识辨，疑为天赐“乌金”。后经省城化验，方知这是珍贵的稀有金属——钨。

从最初的长沙土绅包矿开采，到抗战时期开明矿主周纪勋资助红军，邓阜山的矿洞里流淌的不仅是财富，更有民族大义。特别是周纪勋，在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日后，面对留守游击队的困境，他没有选择为富不仁，而是主动送去大洋与军需物资。那黝黑的钨砂，在那个年代，换回的是革命的枪支与弹药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邓阜山真正迎来了属于它的“高光时刻”。湘东钨矿在此建立，这里迅速崛起为一座繁华的“山中城”。

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千名建设者汇聚于此，邓阜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业乌托邦。1955年，矿区由手工开采转为机械开采，并架巍峨，机声隆隆。1962年，时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两次视察矿区。老工人们至今记得，他在给全矿干部职工作报告时，情到深处，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挥动着双手，讲述长征经历，鼓励大家：“渡过生活的艰难，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！”

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啊？湘东钨矿不仅有轰鸣的矿井，更有自己的学校、医院、电影院、灯光球场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山下是一片漆黑的乡村，而邓阜山上却是灯火通明，宛如“小香港”。矿工们穿着那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，脸上洋溢着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。资料显示，1951年至1980年间，湘东钨矿为国家创造了数亿元财富，那每一吨钨砂，都是新中国工业大厦的一块基石。

然而，资源型城市的命运总是伴随着阵痛。经过60多年的开采，矿竭城衰。2002年，湘东钨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向了破产。机器轰鸣声戛然而止，喧嚣的人群逐渐散去，留下的只有斑驳的厂房和静默的井架，在风雨中诉说着往日的辉煌。

旧貌换新颜

所有的篇章，都是新的序曲。当工业的烟尘散去，邓阜山并没有因此沉寂。近年来，高院镇政府拂去了历史的尘埃，开始重新擦亮邓阜山的名片。废弃的矿井与厂房不再是荒凉的废墟，经过修缮与改造，它们化身诉说工业文明的博物馆。游客们穿行在幽深的矿洞中，抚摸着锈迹斑斑的采矿设备，仿佛穿越时空，触摸到了那个火红年代的脉搏。

一条串联起“邓阜山—高院战斗遗址—湘东钨矿”精品文旅线路正在形成。人们来这里，既是为了凭吊古人的风骨，也是为了缅怀先烈的英雄，更是为了探寻那段激情燃烧的工业记忆。

与此同时，生态修复工程让邓阜山重披绿装。曾经的尾矿库变成了绿地，九渡河的水更清了。每逢周末，游人如织，他们在甘泉佳木间流连，在红色遗址前沉思，在工业遗迹旁拍照。

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邓阜山，这座见证了进士风流、战地烽火与工业辉煌的巍巍高山，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，挺立在湘东大地。它不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，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它告诉后来者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份耕读传家的文脉、那份敢为人先的血性、那份艰苦奋斗的铁骨，永远是这片土地最宝贵的财富。

影集雅次



南社第一次雅集合影

编者按



株洲往事

辛亥风云激荡，南社应运而生。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，南社汇聚了无数热血志士，其中不乏我们株洲醴陵的儿女。然而，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璀璨的诗文背后，仍有一些名字被时光的尘埃掩盖，静默无声。

本期神农周刊刊发《群书检尽知谁是一纸明时鉴昨非》一文，作者潜心史料钩沉，像一位耐心的侦探，从吉光片羽中还原了南社湘集社员——张庆云的真实面貌。她不仅是一位行吟的“通信地址”，也不仅仅是名士刘鹏年的眷属，更是一位在烽火岁月中坚守教育与慈善的醴陵巾帼。

历史的厚度，往往藏在这些看似“无作品”却“有风骨”的细节之中。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，穿越百年的烟云，去重新认识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奇女子。

群书检尽知谁是一纸明时鉴昨非

——南社湘集社员张庆云身份钩沉

问耕轩主

在波澜壮阔的南社研究谱系中，张庆云的名字，曾长久地如同一粒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珠子。

翻开1995年版《醴陵市志》，54位醴陵籍南社社员名单中，未见其名；在《南社湘集姓氏录》里，她也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符号。学者汪梦川先生曾在《南社词人研究》中将其归类为“无作品、无雅集”的“挂名社员”。这一冷冰冰的标签，似乎注定了这位女性社员的面目模糊。

然而，当我们拂去岁月的浮尘，沿着史料的草蛇灰线细细寻觅，一位活跃于民国教育界与慈善界的女性形象逐渐在纸上浮现——她不仅是南社湘集核心成员刘鹏年的夫人，更是醴陵新式女子教育的拓荒者，烽火岁月中难重的守护者。

落星田里的草蛇灰线

解谜的钥匙，藏在1936年3月出版的《南社湘集》第六期附录中。在社交通信录里，“刘鹏年”与“张庆云”两个名字紧邻而列，其后备注的通信地址惊人的一致——“长沙落星田雪庄”。这处位于长沙田域的寓所，不仅是刘鹏年与友雅集的文化空间，更是其家族生活的私密场域。在讲究名分与礼教的民国文人圈，共享一处宅邸地址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却确凿的关系隐喻：她绝非普通社友，而是与刘鹏年休戚与共的亲人。

这一线索，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更深处的历史。

故纸堆中的教育救国

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中一段仅数十字的记载，为这个名字注入了血肉：“民国十二年(1923)，张庆云复于县城瓜埠坪阳祠，设合英女子职业学校，以刺绣、编织为业，得受省款补助。”

简短的方志背后，是一位女性“教育救国”的实绩。彼时的醴陵，风气初开，张庆云在瓜埠坪创立女校，教授女子刺绣编织的一技之长，这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尝试，更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。虽然县志未点明其南社身份，但那个致力公益、目光长远的“张庆云”，与那位“雪庄”女主人，身影已隐约重叠。

“三刘遗集”下的深情互证

真正的确证，出现在对“南社三刘”(刘泽湘、刘谦、刘鹏年)文献的系统梳理中。

在《南社三刘遗集》所收录的《刘鹏年先生传略》一文中，“张庆云”三字赫然在目。据刘鹏年之侄刘作桓先生记述，张庆云祖籍福建永定，随父迁居醴陵，早年即投身平民教育。更令人动容的是刘佛年之妹刘光年的一段回忆：“为了纪念刘家几位杰出的先人……佛哥和堂嫂张庆云女士在堂侄作桓和堂侄女白岚的协助下，不遗余力，花了三四年的时间，搜集资料编写《南社三刘遗集》。”

至此，谜题彻底解开。这位被误读为“挂名社员”的女性，不仅是刘鹏年的妻子，更是他文化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与传承者。正如刘作桓先生所言，刘鹏年一生致力于弘扬国粹，其夫人张庆云给予的“挚诚支持与充分理解”，应当在文学史上“大书一笔”。

从“无字”处读懂南社精神

考辨至此，张庆云(1899—1993)的一生已然清晰：字珠园，醴陵人。她的一生跨越了晚清、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。

在南社的星空中，类似张庆云这样的“家属社员”并非孤例。柳亚子夫人郑佩宜、高旭夫人何昭等三十余位女性，虽鲜有诗文传世，却构成了南社文化生态中温情而坚韧的底色。

张庆云的价值，远不止于“刘鹏年夫人”。抗战军兴，她受兄长张慕先(时任湖南省赈灾委员会事务协理)之托，在湖南主持私立儿童保育院，于战火纷飞中庇护流离失所的难民，以慈母之心践行了南社“忧国忧民”的宗旨。

1993年，张庆云在北京病逝。这位跨越世纪的老人，或许未曾留下传世的诗词歌赋，但她从瓜埠坪女校的朗朗书声，到湘南保育院的如豆灯火，早已用行动写下了比文字更厚重的篇章。

她的故事提醒后来的研究者：历史的叙述不应止步于纸面。当我们读懂了“无作品”的张庆云，才算真正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情。



刘鹏年像